



一江清水北上的背后故事

读文史资料 学百年党史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
人民政协报社
联合主办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庆祝党的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回顾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与人民政协报社从历年出版的文史资料中，选择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回

忆文章重新编发，为党的百年华诞献礼。希望这些文章能够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充分发挥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在宣传普及党的历史知识和理论创新成果方面的重要作用。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航拍图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论证与决策回忆

张基尧

南水北调工程规划分东线、中线和西线三条调水线路：东线从长江江苏省扬州市调水，经江苏省、山东省、河北省到天津市，中线从湖北省汉江中游丹江口水库调水，经河南省、河北省到北京市、天津市；西线规划从长江上游支流修坝建库，调水到黄河上游。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对推进我国北方受水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修复和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追溯南水北调规划的研究论证历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即1952—1959年的探索阶段，1972—1979年以东线工程为重点的规划阶段，1980—1984年的东、中、西线规划研究阶段，1985—1998年的工程论证阶段，1999—2001年的总体规划阶段。20世纪60年代南水北调研究工作由于“文革”的原因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南水北调工程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长期规划、科学论证，吸纳了社会各界众多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经历了深入调研、广泛征询、理性分析、多方案比选、多层次科学论证的过程。2002年8月，《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以全面、深入、科学、合理的面貌进入决策程序。

2002年8月23日，朱镕基总理召开国务院第137次总理办公会议，会议听取了水利部作的《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情况的汇报。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原则同意成立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领导小组

(后改为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年内开工建设南水北调东线江苏境内三阳河、潼河、宝应站工程和山东境内济平干渠工程。会议要求水利部根据会议提出的意见，抓紧修改后向中央汇报。

我有幸参加这次总理办公会，并代表水利部向国务院汇报《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在讨论中，朱总理关心工程的投资情况，并问起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的投资多少，我当时回答“仅460亿元”，其目的是想减弱总理对投资的压力感。可是朱总理立即说：“老张，你好大的口气。”总理一句话使我预感到中央政府对南水北调工程投资更加关心和期待。这些都为事后南水北调工程资金筹措所验证。

10月9日，朱镕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40次总理办公会，批准了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工程的立项申请，要求抓紧编制丹江口水库库区移民安置规划。

2002年10月10日，江泽民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了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和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受国务院委托作的《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汇报，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后，我受委托代表国家计委、水利部向全国人大财经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汇报了《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接受与会人

大常委、代表的询问，听取他们的意见。会后经请示全国人大秘书长何椿霖，得到的回答是，全国人大几个专业委员会代表常委会听取汇报，此后全国人大不再听取有关情况汇报。

10月25日，我代表国家计委、水利部向全国政协汇报《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主持汇报会，钱学森等40多位政协委员听取了汇报。

《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得到了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赞成。我汇报结束后，与会人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对委员们提出的问题逐一回答，并表示一定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向水利部、国家计委汇报。根据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汇报会提出的意见，《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

2002年12月23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经几代人执着追求的南水北调工程由此进入了基本建设程序，部分单项工程在具备条件的前提下陆续开工。

12月27日，南水北调工程开工典礼在人民大会堂和江苏省、山东省施工现场三地同时举行。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从那时起标志着南水北调工程正式进入实施阶段。2003年12月30日中线工程也顺利开工。干旱缺水的北方看到了希望，几代中国人对南水北调的期盼，将从梦想变成现实。

现在回过头来看，南水北调工程得

以上马，我认为主要有四点原因：

第一，该工程受到历任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工程每到一个重要阶段，中央领导都有明确的指示。最明显的是，明确总体规划原则和工作方向，审定总体规划以及可行性研究报告，领导工程建设领导机构组建、制定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征地移民、水污染治理相关政策，筹措工程建设资金等等，所有这些如果没有中央领导的支持，是很难推进的。

第二，南水北调工程经过长期的科学论证，统筹协调。南水北调作为一个巨型系统工程，不仅有工程建设，还有水污染防治、水资源保护、征地移民、文物保护等工作，充分体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第三，南水北调工程有日益发展的综合国力和技术能力为支撑。工程在规划阶段的估算投资额近5000亿元，国家批复的东、中线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投资达2546亿元。这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国家综合实力增长。

第四，一代又一代的水利工作者几十年如一日地执着追求不懈努力。50年的岁月，多少水利科技工作者无怨无悔，为了南水北调工程奉献出青春年华，赤子忠诚，正是这些无名英雄为《南水北调总体规划》夯实了基础，为工程建设提供了必备条件。

(作者曾任中国水利水电工程总公司总经理，水利部副部长，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回忆南水北调中线渠首陶岔工程建设

曹嘉信

1969年11月，我调任邓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1971年10月6日，邓县县委任命我为邓县引丹工程指挥部第二任指挥长，与政委赵兴金(同为县委常委)一起，率领邓县4万民工，进行南水北调中线渠首陶岔工程建设。经过整整4年奋战，高标准地修建了引渠、渠首闸、总干渠，为今天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建在陶岔。陶岔原为邓县九重公社的一个小山村，1972年冬随九重公社划归淅川县。邓县于1969年1月开工，进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陶岔工程建设。

1969年1月26日，在凛冽的寒风中，2万多名邓县民工在陶岔举行了简单的开工典礼。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广大群众有着极其高涨的革命热情。当时群众生活虽然还很难，连温饱也没有解决，但一听到毛主席“南水北调”的伟大号召，便争先恐后地奔赴引丹工地。

1月26日，正是旧历年的年底。广大民工等不及在家过了春节，就带上简单的铺盖，拉着架子车，装上粮食、面粉、工具，冒着严寒，从四面八方，会聚陶岔，安营扎寨，开始了6年之久的渠首工程建设。

民工生活非常艰苦。他们在工地住的草棚，是提前一个月先期到达作施工准备的民工们搭建的。民工们用铁锤砸开冻土，挖一个一米深的地穴，把土培在四周形成土墙，再在土墙上架木梁，在木梁上铺高粱秸杆，然后在上面苫上麦草。这种“半挖半垫”建造的干打垒简易麦秸工棚，不仅节约了建筑材料，还能抵御严寒，但却存在着很大的隐患。这种工棚冬尚可，但开春以后天气转暖，地下热气向上冒，水蒸气增多，工棚内非常潮湿。特别是下雨天，地表水渗入工棚，工棚内地面上都是水。民工只好在工棚中央地上挖一个坑，将渗入的水用桶舀出去。住在这样“水窝”似的工棚里，不少人患上了风湿腿疼腰痛病，有的甚至成为终身的病痛。

民工们喝的是黄水。陶岔不过是一个二三百人的小山村，现在一下子涌进来2万多人，用水立马成为一个很难解决的大问题，几口水井很快成为干井。民工们只好在地势较低的地方挖个土坑，依靠地下渗水，依靠下雨时附近流进来的泥汁水，将这样的泥汁水挑回去，澄一澄做做饭。这样的泥汁水，不仅颜色发黄，而且还有很浓的硫磺味，熬出的稀饭实在难以咽下。就是这样的泥汁水也难以保证供应，民工们只好自觉地洗脸、不用水，保证吃饭问题。面对这种情况，指挥部非常焦急。

守着这一池碧波荡漾的丹江水，民工们却无水煮饭！副指挥长郭如泉经过反复考察，决定先解决民工吃水用水问题。将库内水先引到石盘岗，用高压水泵将水抽到岸上，这才解决了数万民工用水问题。民工们吃的是红薯面窝窝头。

引丹工程开工的时候，上级的支援还没有到位，只好让各个生产队负责安排本生产队民工的生活问题。各生产队送来的大都是杂粮，玉米糝、红薯面、绿豆面、高粱面等。久而久之，不少人患上胃溃疡、胃穿孔等胃病，有些人甚至因此而献出了生命。

面对这样的艰难困苦，民工们豪迈地说：“喝黄汤，尿黄尿，顿顿吃的狼戴帽(窝窝头)。为了革命来引丹，敢把天下苦吃完。”这些豪言壮语，充分体现了英雄的邓县人的坚强意志和蔑视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引丹工程是邓县100多万人的心血工程。全县17到30岁的青年35万多人，有20多万到工地出过力。8年中，全县500多个大队支书、大队长、民兵营长轮流到工地带工，基本上无人空过。24个公社多数由副职领导挂帅，抽调一半干部到工地，一直奋战到底。县直各单位均抽调干部为工地服务。为了引丹工程，各生产队很少建房，很少购买新式农具，一切物力、财力都用在引丹工程上。总之，邓县付出的代价是难以用数字来表达的。引丹灌溉工程，几十万邓县人轮流上阵，前仆后继，整整奋战了8年，如同一次大的战役。8年之中，有153位民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2366位民工负伤致残。英雄的邓县人，做出了巨大牺牲。

为了加快工程进度，构林营民兵陈志刚探索出一种挖“神仙土”的施工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大大提高挖土进度，但却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指挥部从安全角度考虑，明令禁止。但不挖“神仙土”，确实影响了土方挖掘进度，陈志刚为整个引丹工程着想，决心继续试验。考虑到自己随时都有可能遭遇不测，在试验之前，他给指挥部留下一封遗书。在遗书里，他讲述了自己对挖“神仙土”的看法，表达了加快施工进度、建议工程技术人员尽快找到一个不出事故、少出事故的办法，并且表示“我在挖神仙土中如果牺牲，不要追究责任，也没有什么责任可追究，即便死，也是为南水北调而死，是为人民利益而死，是光荣的”。

白牛营民兵秦永顺，在一次爆破中不幸失去左手，伤愈后毅然战斗在工地，被称为独臂英雄。

1974年8月16日，在陶岔渠首举行隆重通水典礼。全体民工、当地群众以及省内外领导、来宾，共10万人参加了这一盛典。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清冽的丹江水奔涌而出，沿着宽敞的总干渠，浩浩荡荡地向下流淌。人们的欢呼声在渠首久久回响。我作为通水总指挥，成功地组织了这次盛典。

1975年7月，我奉调到南阳市人武部工作，从此离开了奋战4年之久的引丹工地。1976年，整个灌区建成，至此，引丹工程宣告结束。引丹工程的建成，改变了邓州西南部缺水的历史，使邓州130万亩土地得到了灌溉。引丹工程高标准修建的引渠、渠首闸、总干渠，又为后来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奠定了基础。

(作者曾任邓县武装部副部长、引汉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南阳市副市长等职。)

我所经历的淅川移民大搬迁

宋超

2009年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库区淅川县试点移民搬迁启动，时任淅川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的我，被任命为县移民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随后的三年多，我和我的同事们一起，经历了那一个个不平常的日日夜夜，耳闻目睹了在移民搬迁中广大移民乡亲、移民干部忠诚奉献、大爱报国的英雄壮举。至今那一幕幕用汗水、泪水和血水交织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淅川县位于豫鄂陕三省结合部，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主要淹没区(淹没面积1050平方公里)，渠首所在地。根据长江委规划，这次移民大搬迁，淅川需搬迁16.5万人，涉及11个库区乡镇168个行政村，占库区两省六县总搬迁人数的一半。按照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的要求，

2009年完成试点移民1万多人搬迁任务，其余15万人在4年内全部完成。

香花镇南王营村地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主干渠源头，被誉为“渠首第一村”。2010年7月12日，该村搬迁的前一天，我们进村入户走访。到村民王秀华家时，得知她是这次移民中年龄最大的，当时已102岁了，就让镇干部给她买了件新衣服。考虑到王秀华的年龄，我们曾动员她坐救护车出发，但她以“不想搞特殊化”为由拒绝。没办法，只得给她做了两次详细体检，确认身体健康后，又安排村妇女主任一路陪同。第二天早上，老人穿着新衣、新鞋袜，胸佩红花，高兴地和她、孙媳一起登上搬迁的客车。

从6月17日第一批移民搬迁启动到9月4日，我们苦战80多天，按时完成

了第一批6.5万人移民搬迁任务。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给河南省委、省政府发来贺电，河南省委、省政府对南阳市委、市政府和淅川县委、县政府致信表扬。

淅川大移民的顺利完成，凝聚着移民作出的牺牲，饱含着移民干部的奉献。正是他们，创造了移民工作的“淅川模式”“淅川经验”，铸造了“忠诚奉献、大爱报国”的“移民精神”。

被称为“移民标本”的何照胜，一生经历3次大搬迁，辗转3省4地。他23岁远赴青海，后因自然环境恶劣，两年后回到淅川。30岁再迁湖北荆门，后来再迁老家。2011年6月，他所在的仓房镇沿江村需要搬迁，已经75岁高龄，拄着拐杖走路的老人又要再次离开故乡，搬迁

到黄河以北太行山下的新乡辉县市。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在搬迁。但老人没有怨言，他说：“走就走吧，国家的事，咱得支持。再说搬到哪儿，不都还是淅川人。”

在淅川，像何照胜这样的移民成千上万。他们祖祖辈辈靠水而居，就是因为生活在丹江边，因为国家工程建设需要，一生都在颠沛流离。有一位偏僻的76岁老太太，搬迁当天早上，儿子背着她上了车，在迁往许昌的7个小时途中，拿着发给她的鸡蛋、火腿和水，却不吃不喝。她说：“喝了水，还得上厕所，不能给大家伙添麻烦。”

在移民搬迁中，从县四大班子领导到乡镇、县直单位负责人到一般同志和村组干部，长期坚守在一线拼命工作，许多干部身体累垮，嗓子喊哑，甚至被打骂，却无怨无悔。有10位同志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公安卫生电力交通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及志愿者，昼夜奋战在搬迁一线。没有他们无怨无悔的付出，就没有移民搬迁的顺利完成。

向所有参加此项工作的同志们致敬！(作者时任淅川县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县移民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现任南阳市国资委主任。)



陶岔渠首 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宋超 摄

本版文章选自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和河南省政协文化和文史委员会编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有删节。